

NONGMINGGONGSHEHUIGONGZUO DE LILUN YU SHIJIAN
LAIZI YUESUISHEGONGFUWU JINGYAN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来自粤穗社工服务经验

谢建社◎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镇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研究”（12AZD026）阶段性成果

广东省普通高校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广州大学2014年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2014GWXM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NONGMINGGONGSHEHUIJINGONGZUO DE LILUN YU SHIJIAN

LAIZI YUESUISHEGONGFUWU JINGYAN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来自粤穗社工服务经验

谢建社◎编著

社会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来自粤穗社工服务经验/
谢建社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87-5068-2

I. ①农… II. ①谢… III. ①民工—城市化—社会工作—
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2378 号

书 名: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来自粤穗社工服务经验
编 著: 谢建社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李 浩
责任编辑: 彭先芬

责任校对: 高建春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编辑部: (010)58124862
邮购部: (010)58124848
销售部: (010)58124845
传 真: (010)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创新农民工服务是当代中国 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①

代前言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于是,农民工服务也就成为社会工作开拓服务的新领域。因此,探索在现有制度下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方法,研究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中提升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归属感也就成为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21 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世纪。我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城市化核心就是要提升农民工的素质,让农民工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一般而

^① 本章节引自郑杭生:《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课题》,载于《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本研究得到郑杭生老师的精心指导和高度评价,作者以此追思郑老师。

言,市民化是指农民,尤其是在城里做工的农民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封闭、分散的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镇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自身发展社会化的需要,融入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融入城市社会机制的建构,显得越来越迫切。本研究团队多年来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对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入机制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入性教育研究,农民工社会工作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一,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成熟协调机制是指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公平合理地分享城市化发展的财富和利益。初步协调主要是供需总量的协调,而成熟协调则是在量的协调基础上达到质的协调。城市化的发展使市民生活的质量不断提高,进城农民工,也即“新型市民”、“新型员工”或“新产业阶层”生活的质量也应有相应的提高。第二,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接纳机制”。接纳是推进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的重要步骤,城市普遍接纳更是促进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的强大动力。“接纳机制”具体体现在农民工“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报酬有标准,管理有参与,维权有渠道,住宿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尊严,养老有保障”的十有“接纳目标”。然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和社会工作者的推动,才有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进程。

本研究团队在近几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我们在继 2005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专著《新产

业阶层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之后,又于2009年连续推出《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与《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两部专著,在调查—分析—研究—再调查—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就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状况、问题与对策展开深入探讨,这一成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体现。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如农民工补偿教育、融入性教育、城市接纳机制、可市民化群体、逆市民化群体等。农民工在融入城镇过程中,他们的生活、身心适应问题、他们自身的素质教育问题以及他们的子女融入与教育问题,都迫切需要研究。于是,本研究团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基本形成粤穗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农民工社会工作是根据农民工进城后的各种需要,通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帮助农民工个人、群体增强其融入城镇社会的能力,并创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目标实现的市民化的专业的助人自助活动。

这一系列著作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敏感的问题意识:生动刻画出农民工独特生存逻辑下的社会困境。30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实践层面和学术层面共同关注、长期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催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农民工主体已经悄然更新换代,“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民工的研究逻辑也随之发生转换。改革开放至今,如果笼统地把农民工研究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前20年,即20世纪末的20年,主要是关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研究;而进入21世纪的10年,特别是近5年来,重心则逐步转移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上。伴随着实践场景中农民工主体的转移,相应的逻辑与话语主题也自然的发生转换。

正是基于农民工主体转换的现实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教授于1999年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颇具学术意蕴与解释力的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应与相区别,同时又具有全新内涵的称谓,特指在城镇务工的80后或者90后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生,并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迄今已经成为我国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既为社会结构所形塑,又会影响并改变社会结构的面貌,特别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务工与生活的城镇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但被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近乎凝固的阶层化事实,让他们挣扎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外,更让他们看到融入城市的艰难。因此,有不止一项的研究表明,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种种社会距离,处于不同程度的社会隔离之中。这些无疑是社会结构中的消极因素,并埋下了社会失序的隐患。因此,在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完成市民化,最后融入城市社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否的大局。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市化中难以回避的一个棘手问题。与他们父辈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并拥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城市生存逻辑。与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与理想追求,非常渴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有着更为强大的利益意识与诉求;他们以城市为参照物,对职业福利等的要求都比他们父辈高;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各方面都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的待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自2004年初步呈现,而后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蔓延数年,目前又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进一步加剧的“民工荒”现象,就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群体性生存逻辑相联系,并进而认为,“民工荒”的实质不过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极度不平衡的劳资格局与低

廉的劳动力成本的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生存逻辑支配下,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家乡渐行渐远,但又因种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障碍,难以完全地被所在城市社会接纳。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持久地持续下去,必将诱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是谢建社教授关注与提出的核心问题。

第二,独特的研究视角:沉到关键社会事实中去寻求问题的解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出之后,作者选择了独辟蹊径的一个研究视角,试图去寻找与接近问题的答案。鉴于近年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事实,谢建社选取的求解视角是,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群体为研究突破点。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社会事实是,他们在高频率的行为失范与居高犯罪率的状态下生存和行动。一方面,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归属”与“理想自我”是以城市为参照的;另一方面,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却是充满着失望或者绝望,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目标与达到目标之间存在的几乎是遥不可及的距离,都屡屡把他们的“城市之梦”撞得支离破碎。因而,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就是一种“失范”性的融入。在这一布满荆棘的过程中,那些不幸“融入”了“高墙”的人们,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获得了分析与解剖的标本意义。也因此,透析农民工犯罪群体,阐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独到价值。

农民工个体或群体在与城市社会互构过程中的越轨行为,是社会学基本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生动体现。本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元问题出发,考察农民工越轨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以时空情境转换为背景,运用近几年实地调查所获一手资料和国内外发表的相关文献,研究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多元、多维的互构关系及复杂多变的互构过程。重点关注农民工、本地居民和当地政府之间

的互构过程,并以此解释农民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适应策略^①。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作者们一致认为,农民工在融入城镇过程中,面临着两个转变:第一,互构主体与互构关系的转变,即农民与农村社会的互构关系演变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互构关系;第二,互构过程所处时空情境的转变,即农村社会的时空情境转变为城市社会的时空情境。农民工在融入城镇过程中,他们的适应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作者从社会最底层提取出来的研究结论,给所有相关与不相关的他人留下了可期望的空间。在分析处理了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抽象出了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若干相关问题,如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适应性问题、融入城镇的教育补偿问题、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城市接纳机制与接纳目标以及农民工服务的经验与模式等。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难点主要在于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等方面,而技能教育、文化教育为农民工融入城镇难的根本问题所在。这些基础性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厚实铺垫。

第三,经世致用的策略性思路:农民工社会服务模式的建构。城市化与农民工系列研究是作者的经验研究之作,而经验研究往往天然地具有更强烈的实践与策略指向。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并服务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这不仅是我们学者所怀有的一种社会关怀情结,更是我们学者的学术理想。本研究在分析农民工融入城镇过程中种种困难之后,提出一种富有创意的策略性思路,即建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本研究以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近年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重点,通过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中社工服务农民工的典型个案为例,探

^① 谢宇:《时空情境中的农民工越轨行为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讨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农民工社会工作借助人行为与社会系统等理论帮助农民工更好地与城镇环境融合,是基于公民权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展开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是帮助农民工个人、群体增强其融入城镇社会能力,并创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目标实现的市民化的专业的助人自助活动。农民工社会工作在于促进我国城乡社会变迁与城乡居民关系的融合,加强和提升农民工对城镇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宗旨是挖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全部潜能,丰富农民工的城镇生活,帮助农民工解决融入城镇过程中的问题。农民工社会工作者正是城乡社会变迁、农民工城镇生活、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农民工家庭发展与进步的促进者。农民工社会工作是农民工融入城镇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系统。

作者从宏观的层面入手,提出了优化农民工的社会化环境,认为要从根本上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打工无前途,回乡无脸见父母”的城镇融入难题,应从制度变迁开始。现有户籍制度等既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更是偏离了农民工的利益轨道,还造成了农民工严重的权利缺失,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把农民工的权利保障纳入制度建设当中,就成为农民工消解融入难题的关键点。于是,作者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切入农民工服务模式的建构。这必须找准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所在、需求所在,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心理调适,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以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转换,达到与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体化。

目 录

第一章 思考: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新领域	(1)
一、农民工社会工作呼之而出	(1)
二、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5)
三、农民工社会工作新路径新方法	(7)
第二章 分层: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现实路径	(21)
一、剩余劳动力流动,农民分化加速	(21)
二、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路径	(25)
第三章 冲突:农民工融入城镇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35)
一、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冲突与分析	(35)
二、农民工的社会心理素质亟待提高	(47)
三、企业欠薪导致农民工进入日薪制劳务市场	(66)
第四章 教育:提升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能力	(81)
一、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关键问题在于教育	(81)
二、农民工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84)

三、农民工教育的对策和模式分析	(87)
四、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服务的方法与技巧	(91)
五、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异地高考新政	(103)
 第五章 融入:农民工服务创新的粤穗模式	(126)
一、新广州人服务的环境与内容	(126)
二、新广州人特色服务	(131)
三、新广州人服务成效	(136)
四、新广州人服务发展前景	(142)
五、新广州人服务的典型案例	(144)
 第六章 马路天使:美丽了城市美丽了梦想	(153)
一、环卫工人生存与发展状况	(154)
二、环卫工人的发展需求	(157)
三、创新环卫工人服务与管理之对策	(160)
 第七章 融城新法宝:从农民统战到农民工统战	(167)
一、社会转型时期统战阶层新变化	(168)
二、社会发展时期农民工统战工作创新	(173)
 第八章 探讨:社会组织在农民工融入城镇中的作用	(179)
一、社会组织在农民工权益维护方面的援助	(180)
二、社会组织为农民工市民化发挥重要作用	(183)
三、社会组织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形式	(187)
 后 记	(193)

第一章 思考: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新领域

城市化是传统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封闭、分散的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以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1]。

一、农民工社会工作呼之而出

(一) 城镇化为农民工社会工作提供了大舞台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现象。1958年确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深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导致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向往城市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社会保障等诸多利益的“诱惑”,正是对农民心向往之的进城拉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土地报酬呈现相对递减的趋势,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2],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度下降,农业收益也远远赶不上工业、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推”向城镇。在“推力”与“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城镇。如今,我国农民工规模

已经达到 2.61 亿人^[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在城镇站住脚,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固定的居所。即使一些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居民^[4]。

当前,社会工作涉及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但处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还有较多的空白地带,迫切需要我们去开拓。

(二) 富士康“N 连跳”反映农民工融城心理严重失调

2010 年 5 月 21 日凌晨,21 岁的富士康农民工南某选择用自杀方式继续着富士康悲剧的“N 连跳”,这使得有着全球“代工王”之称的富士康,不到半年内连续出现“N 连跳”系列自杀事件。公众纷纷质疑,富士康不“健康”。年轻的农民工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社会呼吁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农民工如何不再被动接受这种“关怀”?

农民工为什么“前仆后继”地选择了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富士康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缺陷,而且也暴露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农民工真实的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共服务。可是这些需求在企业里难以得到满足,富士康不是特例,而是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集中反映,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农民工用生命呼唤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问题^[5]。

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农民工悄然登上城镇化的舞台,并逐步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怀着城市的梦想,特别是刚进入城市,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农民工在进城之

前或在城镇就业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受挫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抵御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较差,当一个又一个挫折、失望、困惑来临而又无法得到及时帮助(如富士康农民工心理上的失望、孤立、压抑和无助),或无法通过自身心理调节实现心理转型,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心理抑郁和焦虑,形成心理疾病,在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状况得不到及时救治和疏导时,最终就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在社会精神救助体系不健全、社会救助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就避免不了自杀的厄运。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富士康的自杀现象,而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富士康农民工“N连跳”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政府、企业和社会不可忽视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的提升问题。在日本,企业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除了在员工有烦恼时提供咨询外,还要求主管平时注意员工心理状况,并定期实施心理诊疗。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为员工送上“心灵鸡汤”。富士康“N连跳”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只是为了钱,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满足他们的社会心理诉求。

社会心理适应是农民工融城的最好标志。与社会生存适应相比,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是内在的,难以趋同。而农民工只有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才能有效地完成社会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镇社会^[6]。

(三) 犯罪率居高不下反映农民工难以逾越融城之墙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是青年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既具有农民工的一般特点,受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结

构的制约,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引导和支持,又凸显出作为青年的一般特点,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对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镇,他们如何才能市民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学界深度思考。当前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融入不了城镇,不能成为城镇市民,又退不回农村,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必将走进融入城镇与被城镇的两难境地。于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将会产生可市民化与逆市民化两大群体^[7]。

我们课题组先后于2007年6—8月和2013年6—8月两次深入农民工输入地广东省GGF三大监狱、广东省两个看守所以及农民工输出地江西省未成年人监狱,共召开20余场座谈会,发放3500份问卷,实施120个个案访谈,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

农民工是有“梦”的一族,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迫切希望融入城镇,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政策和制度之墙;退回农村,却又做不了合格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成为一道风景,却不那么亮丽。这一现象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与更多的忧愁。新生代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7]。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凸显,一方面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却又难以融入城镇,且处于城镇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8]。

(四) 裕元鞋厂罢工事件反映农民工融城身份极度缺位

2014年4月14日开始,广东省东莞市裕元鞋厂发生了一起约3万工人罢工事件,此次罢工行为持续12天,直至26日停止罢工恢复正常工作。由于这次的罢工事件参与人数众多,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裕元鞋厂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位于东莞市高埗镇,是耐克、阿迪达斯、REEBOK、SALOMON 等世界名牌运动鞋最大的生产基地。该厂从1988年在东莞市高埗镇投资设厂以来,目前已形成多个厂区,员工达6万多人,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类产品公司进行代工。裕元鞋厂作为我国一个工业大厂,应该率先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促进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但其并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不仅如此,相关部门也没有对裕元鞋厂进行有效的监管,导致了裕元鞋厂能够钻法律空子,多年不为工人缴纳社保。裕元鞋厂的农民工质疑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农民工购买社保,与农民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瞒行为。事实上,这次罢工行动早于4月5日就已经开始,到14日时才将事件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裕元鞋厂农民工罢工事件反映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所折射的是农民工心理融入、身份融入和社会融入问题。我们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当中的一部分,还在他们的流动儿童时期,由于所处环境影响,就开始出现自卑、自闭、压抑、受不了批评等心理特征。如性格内向(22.15%)、精神压抑(16.85%)、自卑和自闭(14.34%)、不愿听批评(11.16%)、说不清(6.23%)、性格开朗(15.25%),自信和自尊(14.02%)。我们在访谈时也发现,一些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说购买社保。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定位、心理素质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实现农民工有序市民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热门话题,也是难点问题。政府购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正在珠三角地区城市兴起,各种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积极开展“亲情治理、温馨服务”活动,使农民工